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

阅读中国系列

THE COLLECTED
WORKS ON HISTORY
OF THOUGHT
IN SUNG DYNASTY

宋代思想

〔美〕

田

浩

(Hoyt Cleveland Tillman)

杨立华 吴艳红等

译 编

史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THE COLLECTED WORKS ON
HISTORY OF THOUGHT IN SUNG DYNASTY

宋代思想史论

[美]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 编
杨立华 吴艳红等 译
姜长苏等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阅读中国序

刘 东

已经是第二次在为这类译丛撰写总序了，这件事本身就使我忧心忡忡——我们如此大规模地引进当代汉学，究竟最终对中国文化是福是祸？

如果在上次作序的时候，我们对于西方同行的工作还只知一鳞半爪，那么今番再来作序，简直就像在介绍老朋友的一些新作了。换句话说，其实再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曾对汉学有过现在这样系统的、与时俱进的知识，不仅可以密切关注其学术发展的动向，就连译介工作都与其展开过程日渐同步。这当然可以算作一种成绩，不过这小小的成绩却不仅没有使我沾沾自喜，反倒带来了进一步的精神煎熬。作为长期以来此类工作的主要主持者，我完全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古代的佛学是这样，近代的西学是这样，当代的汉学也肯定会是这样。

的确不错，如果借用康德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说，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环境本身，往往会产生某种“先验幻象”，以致对那些先入为主的价值或事实判定，会像对于“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执信。也正因为这样，那些学术研究家的文化使命，才恰在于检讨现有的知识缺

陷，适时地进行修补、突破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挑明：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生而为“中国人”，就足以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恰恰相反，为了防范心智的僵化和老化，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包括汉学）尽量洞开，拥抱那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变动不居的“中国”。

然而，僵化的另一面却又是泡沫化。汉学毕竟既是中学的一支，更是西学的一支，那中间潜伏着许多未曾言明的外在预设，本质上跟本土的国学判然分属于两大话语系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国传统早在西风中受到过剧烈震撼，可一旦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汉学，它仍然要面对着新一轮的严峻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说，此间的挑战竟还大过对于主流西学的引进，因为它有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这种要命的相对化刺痛着我们：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而无力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

幸而，我们还没有泯灭进行文明对话的渴望，还把这种对话看成惟一现实的救度之路。在这种深深的渴望之中，国学与汉学这两种自成系统的学术话语，在彼此解构与相互竞争的同时，就仍有可能彼此解毒和相互补充，从而在文明之间激发出辩证发展的“中国性”来。换句话说，对抗着堕入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双重危险，那个构成了两大学术群体之对话基础的“中国性”，作为双方共同意识的主动构成物，仍有可能在学术的文化间性中不断漂移，在互动的知识增长中不断漂移，在超越的文明对话中不断漂移，从而使我们既不丧失自我认同的坚实前提，又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

由此一来，“中国”一词所包藏的无尽学术潜力，中国研究领域所蕴涵的无穷思想魅力，也就太值得发挥主动精神去阅读去

领略了！这个肯定要伴随我们生命始终的学习过程，也同样需要既不封闭又不盲从的阅读心态，以便同时对抗固陋的本质主义和油滑的虚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像当年的佛学曾经挑战出了宋学高峰一样，我们现在大规模引进的汉学成果，也有可能表现为空前文化创造力的机遇和前奏；而中国事实也终究有可能不再只被遵循外来语法去解释，相反倒有可能在理论创新上对世界表现出顺差。——大家赶紧打开这些书本吧，因为所有这一切，其实全都在我们的一念之中！

刘 东

2001年12月18日于北大草庐

目 录

编者序言	田 浩 / 1
美国的宋代思想研究——最近的情况	〔日〕吾妻重二 / 7
在倒塌的偶像与高贵的梦想之间：中国思想史 领域的札记	詹启华 / 30
儒学研究的一个新指向：新儒学与道学之间 差异的检讨	田 浩 / 77
儒家思想中的几个极点	史华慈 / 98
政府、社会和国家——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 政治观点	包弼德 / 111
苏轼与文	包弼德 / 184
作为超越道德主义者的新儒家：争论、异端和正统	刘子健 / 231
朱熹哲学体系中的道德与知识	余英时 / 257

- 朱熹关于历家和他们的知识——在传统中国一位
学者对专门科学知识的态度 [韩] 金永植 / 285
- 朱熹与卜筮 艾周思 / 304
- 朱熹与女子教育 柏清韵 / 349
- 宋代的思维模式与言说方式——关于“语录”体的
几点思考 贾德纳 / 394
- “朱陆异同”——一个哲学诠释 黄进兴 / 426
- 陆九渊，书院与乡村社会问题 韩明士 / 445
- 行动中的知识分子与官员：中国宋代的书院和社仓
..... 田 浩 / 475
- 《诗经》学上的转折点：论宋学关于《诗》乐问题
..... 闵道安 / 489
- 陈亮论公与法 田 浩 / 518
- 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 蔡涵墨 / 577

编者序言

田 浩 (Hoyt Tillman)

在 20 世纪后期的宋代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潮和主题，其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多样与正统之间，多元性和一元权威之间，世界主义的开放态度和基于文化、民族认同的排外主义之间的张力。在 20 世纪的前 70 年，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有关宋代思想的论著，都集中于以程颐和朱熹为中心的“正统”，对之进行赞扬或抨击，而宋代思想的其他流派则被置于边缘，甚至遭到忽视。例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将所谓“法家”（特别是王安石和陈亮）称颂为正统儒家的挑战者。这正足以促进一些美国学者对儒家的信奉，例如陈荣捷和狄百瑞 (Wm. Theodore de Bary) 之于程朱学。在 1982 年夏威夷国际朱熹研讨会上，北京老资格学者的论文对朱熹的学术尤其是他的形而上学做出了正面的评价，这使得对儒家的尊奉得到强化。自 80 年代以来，杜维明在中国尽力提倡儒家尤其是正统儒家的思想。狄百瑞教授也与中国国际儒联的学者共同协作，召集了一系列会议，探讨孔子、孟子、朱熹与当代问题比如人权的相关性。数十年来，杜维明和狄百瑞教授在阐扬正统儒家的真理性及恒久价值的美国学者中一直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其论著已广为中国读者所知，所以在本卷中未收入他们的论文。

本卷中收入的大部分论文致力于揭示儒家思想家和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自 80 年代以来，

这一从历史、文化语境入手的路径变得日益重要。田浩的《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Harvard, 198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较早地探讨了这两位宋代思想家在思考和论辩当时紧迫的政治、军事、文化问题的过程中所处的历史语境。这部论著也力图促进对于朱熹学派之外的思想家的严谨研究。其他的学者继续拓展了这一讨论，比如包弼德（Peter Bol）将苏轼和王安石作为面对北宋时代课题的严肃思想家而重新予以的关注。此外，韩明士（Robert Hymes）辩驳了认为陆九渊鄙视读书和经典的传统看法。在1992年，田浩的 *Confucian Discourse and Zhu Xi's Ascendancy* 一书力图进一步扩展美国学者对于宋代思想家的研究范围。首先，以石田肇的论著为基础，田浩认为我们不应该继续简单地将那些最苛刻的批评者对朱熹的攻击视为政客对知识分子的排斥。田浩试图表明这些世儒忠实于汉代通行的儒家观念。而且，这些批评者弃绝所有宋学（包括苏轼的学派和二程的学派），将之视为近世之人为获取名利而发明的自利之术。因其在文化论争中失败，他们的作品大多散佚，即使是留存下来的也经常被忽视。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理解宋代文化、政治之争的历史语境，也需要更好地掌握这些失败者的观点和视野。宋代的世儒还可以提供一个考察17世纪“汉学”复兴的视角，至少，后来汉学对于宋学的拒斥看上去反映了12世纪某些世儒对于宋代思想主潮的不满。

对于道学自身内部的研究，是田浩将讨论扩展到程朱正统之外的第二方面努力。除了再现张九成作为南宋早期道学领域的面貌，田浩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吕祖谦不仅是12世纪70年代道学圈子中的领袖人物，而且，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哲学论著值得关注。正如包弼德教授所示，将苏轼仅仅归类为散文家和诗人是怎样地失误，田浩也指出，吕祖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史家。虽然吕祖谦比朱熹小7岁，中进士则晚了15年，但朱熹对吕祖谦表示了从未给予任何同时代其他人的尊重。而且，正如朱熹在1181年为吕祖谦所作谏词中所说，道学不再有领袖人物，而

朱熹也不再有能为之纠偏指正的诤友。其后，朱熹逐渐确信自己的道学领袖的地位，然而在道学内部，这并非是不争的共识，而且他的圈子之外的同代人也继续将道学视为一个决不仅仅限于朱熹圈子的团体。田浩在1992年写的那部书已经修改扩充为《朱熹的思维世界》（台北，1996；西安，2000）。

本卷收入的头三篇论文是对美国宋代思想研究之演进的总体分析。吾妻重二教授对这一领域所做的概述，是他在普林斯顿的休假年研究计划的成果。身处大阪的吾妻教授从一个相对客观的视角勾画的美国学术的图景，对于中国读者进入美国宋代思想研究领域应该是有帮助的。第二，詹启华（Lionel Jensen）教授对该领域之演进的分析则具有更加鲜明的论点，更明确地提出了许多在争论中的问题。第三，田浩在1992年《东西方哲学》上发表的论文提倡儒学思想研究的新方向，旨在提出一种新的取向代替那时美国学者中流行的新儒学（Neo-Confucian）进路。田浩对这一领域所做的概述在1993年由“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发表，其中试图区分80年代早期兴起的新路向与比较确定的正统立场，田浩将这一新路向称为“新文化史”，这一名词指示了要将哲学思想置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背景之中。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也在90年代使文化史成为既不同于哲学史又不同于思想史的独特研究取向。艾尔曼教授的方法自90年代中期以来切实地影响了美国和东亚的学者。一些学者日益趋向于“文化研究”，历史研究不再像20世纪时那样处于中心位置了。而田浩的论点正是指出历史研究和思想自身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宋代以及历史留给现实的遗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即使读者并不考虑田浩的上述观点，收入本卷的这些论文也能为中国读者提供20世纪晚期美国宋代思想史研究的学术面貌。再有，对这些论文简要的介绍还能够使中国读者对于这一时期美国学术所提出的问题有所感受。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产生的答案和使用的材料将继续影响这一领域目前和以后所能提出的问题。

当然，这部论文集的另一个意图是展现宋代思想史的一些主要研究，从而使中国读者得以窥见美国学术出版的范围和规模。在这里，我将简要地对之加以介绍。在吾妻重二、詹启华教授和田浩的论文之后，读者将看到这一领域的一个早期的里程碑：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关于中国思想中的极点的论文，这篇文章使得美国学界开始意识到儒家思想内部的矛盾和歧义，这在思想家应对社会和政府中的伦理及实际难题时表现得尤为显著。为了纪念史华慈教授（1916~1999）努力促进美国学者认识到中国思想的复杂性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价值，我们将这部论文集敬献给他。

本书通过这些对美国宋代思想史研究的介绍，意在引发读者去探讨包弼德教授关于北宋晚期不同思想取向的论文。其中一篇对比了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观点，另外一篇使我们进入北宋的易学。我当初希望收入包弼德研究中唐至北宋思潮变迁的专著中有关苏轼的一章，但是其书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下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已故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子健先生。通过考察政治与思想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刘教授对两宋之际的转折做了重要的洞察。此外，关于道学是如何从起初作为一个受压制的异见团体到1241年被尊为国家正统的问题，刘教授最先进行了探讨。后来，田浩提出一些论据，认为刘教授所谓的道学一词原本是批评者用以嘲讽这个团体的观点值得商榷；余英时教授在即将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也不同意中国“内向化”（turning inward）的论断。即使如此，刘教授的著述仍然是宋史研究中重要的里程碑。

接下来，最大一部分篇幅的论文集中于朱熹。余英时教授的论文探讨了朱熹哲学体系中道德与知识的张力，他指出朱熹给予智识之探索以优先性。虽然，余教授对于中国其他时代的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更为著名，但他对朱熹的深刻兴趣是显而易见的——他为今年初出版的朱熹新版文集题写了序言。而且，他的两篇序言稿成为其专论即《朱熹的历史世界》的基础（允晨文化公司，

2000)。这一部分的第二篇论文可以看成是对余教授关于朱熹之智识观点这一主题的扩展，它概述了朱熹如何看待历法专家以及他们的专业知识，这篇论文是金永植教授所作，他是国际东亚科学研究会现任会长。将这篇论文收入本论文集可能显得不太适当，因为金教授任职于汉城大学。但他是在哈佛和普林斯顿获得博士学位的，而且，这篇文章出自他研究朱熹自然哲学的学位论文。论文的修订本正由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刊印，我希望于近几年内这部专论能在中国全文翻译出版。第三篇是艾周思（Joseph Adler）教授探讨朱熹对卜筮的看法的论文，这篇文章与包弼德教授有关易学的论文都收在一本讨论宋代易学的书中。第四篇是柏清韵（Bettine Birge）教授的论文，它研究了朱熹对待妇女教育的立场，由此论证了朱熹妇女观点的复杂性。柏清韵教授于1989年写的论文和最近的论著都在研究朱熹及其学派对于妇女地位的影响，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揭示朱熹学派在性别问题上的复杂性已经成为美国学者关于宋及宋以后社会史研究的一个主题。第五篇贾德讷（Daniel Gardner）的论文就《朱子语类》探讨了宋代的思想范型和话语模式。

最后一组论文越出朱熹的圈子而予其对手和批评者以更多的注视。首先，黄进兴的论文对朱陆之别做出了新的哲学解释。尽管黄教授就职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但他是在史华慈和余英时教授的指导下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的，而且这篇论文出自他在哈佛就开始的对陆王学的研究，所以将之收入本卷是适当的。第二，韩明士教授研究陆九渊的论文发现了陆九渊有关书院以及地方建设问题的观点。与此相类，田浩（Hoyt Tillman）的论文讨论了作为地方和国家行动中心的书院和社仓，并揭示了官员和学者对公共机构（institutions）的贡献，然而史家却通常将这一声誉予以朱熹一人。第三，虽然闵道安（Achim Mittag）更倾向于朱熹，但他也讨论了其他学者的贡献以及他们的经学对于朱熹《诗集传》的影响。第四，田浩教授关于法与公的论文表明，陈亮在全力应对宋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实在是始自经典时代而

在宋代继续其哲学发展的学术谱系中的一员。第五，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举出了广泛而具说服力的证据，说明朱熹如何以及为什么将秦桧丑化成一个奸臣。他生动地揭示了朱熹及其弟子如何扭曲历史以服务于特殊的意识形态目的。詹启华教授可能会说田浩和蔡涵墨的论文在论文集中最为明确地挑战当代对于朱熹正统地位的维护。至少，20世纪晚期的这三位美国学者力图消解程朱正统的中心地位，以恢复宋代其他学派和学术谱系的声音。这部论文集的大部分作者更愿意坚持对朱熹的更为正面的论述，然而他们都在尽力促进我们对宋代历史语境和普遍问题的把握。20世纪晚期以来，程朱学派的主导地位逐渐成为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而不仅仅将之视为其哲学成就和恒久儒家真理的结果。

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是包括作者和译者在内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协作的结果。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和中国社科院的罗琳小姐、贺照田先生。我十分赞赏他们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所做的努力。此外，杨立华、贺照田先生负责物色译者，姜长苏先生负责联系编者并帮助订正译文原稿，在此，我向这几位年轻学者特别致谢。

（江湄 译）

美国的宋代思想研究

——最近的情况

〔日〕吾妻重二

说 明 此文原是用日文写的，所以在本文与文献目录中，有时提到日文著作。我想，日本学者对美国汉学的认识与了解，对中国的研究者也一定有值得参考之处。因此，现在补充几种中文译著，除在修辞上有一些修改之外，没有改变原文的基本内容。

序 言

目前，美国的中国研究（Sinology）呈现出十分繁荣的景象。尤其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及称为“后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的明清史方面，其研究水平之高，是各国的学界都予以承认的。此种美国汉学的活力与力量，看来还已扩展到我所专攻的宋代思想史研究中。从1995年4月起，我作为访问学者在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逗留将近一年，在此期间，我所得到的印象也正是如此。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略述此一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动向。对于这种情况，中日学者似乎还不太了解，所以我相信此文至少可以为同行们提供不少信息。

论及主题之前，先要提到一些有关基本事项。第一件是，关

于二战后美国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出现的各种取向与其贡献，柯保安（Paul A. Cohen）著、佐藤慎一教授译的《知之帝国主义》^①以及佐藤教授自己的文章^②已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知识。宋代思想研究自然与这动向有关系，而且美国的不少汉学家都在连接宋代与近代的广阔视野之下进行研究，因而这些著作对宋代研究者也是值得一读的。第二件是，关于美国学术界的具体情形，在美国密执安大学任教的蒲地典子教授曾做过介绍，^③关于大学的研究教育环境，关西大学河田悌一教授也有介绍。^④虽然这些文章也都是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主，可是通过以上诸文献，我们可以得到对美国汉学的基本了解。第三件是，孙越生、陈书梅主编的《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此书是对1981年的旧版加以扩充与修改而成的，内容上虽有一部分已过时的信息，但查考美国汉学家的经历时，此书目前仍是最方便的工具书。普林斯顿大学葛士德东方图书馆（Gest Oriental Library）的工具书室也备置此书，我在该校做研究时经常利用它。

关于本文主题的宋代思想史研究，业已去世的陈荣捷（Wing-tsit Chan）教授曾有《欧美之朱子学》一文^⑤介绍西方的有关研究。不过他所涉及的范围以朱子学为限，而且其叙述时期也只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可是，据我的印象，最近十几年间，美国的研究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已获得长足的发展。正因如此，本文拟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诸项成果为中心，特别是以今后会发生影响的新的论点与研究成果为主要对象。从这个意义上，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教授的《80年代中叶以来美国的宋代思想史研究》一文^⑥，给了我不少启发。

一 “Neo-Confucianism” 一词的问题

——视角的反省

首先，以研究视角的问题为中心进行探索。

战后以来领导美国宋代儒学研究的学者，无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名誉教授以及达慕斯大学（Dartmouth College）的已故陈荣捷教授。他们是学问上的挚友，两人都通过许多著书与翻译工作，致力于提高相对落后的研究水平。陈荣捷到晚年也孜孜不倦，1982年在夏威夷大学主持规模很大的国际朱子学术会议并编纂其会议论文集《朱熹与新儒学》一书^⑦，还有《北溪字义》的英译^⑧及简洁的概论《朱熹：生平与思想》^⑨等书问世。不仅如此，他还汇集多年来积累的考证性文章，出版了《朱熹：新的探索》。^⑩此书就是《朱子新探索》（台北，学生书局，1988）的英译改订版。1994年他去世之时，其讣告由狄百瑞亲自撰写。

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任副校长的狄百瑞教授，从1964年以来定期举办新儒学的讨论会，还从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讨论会的论文集。他所走的道路，在他自己的回忆录^⑪中已有较详细的介绍。总而言之，他在西方的影响比陈荣捷还要大，其著作实在不可胜数。比如，儒学史方面的近著有《新儒学的正统与心学》^⑫、《新儒学的心的概念》^⑬、《中国的自由传统》^⑭以及《为己之学》^⑮等。其中，《新儒学的正统与心学》与《新儒学的心的意旨》两书则发掘程朱理学的“心学”因素而促进重新审核“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这一单纯分类所含的问题；在《中国的自由传统》与《为己之学》中，他试图在朱子学的发展过程中找出“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除此之外，狄百瑞还编辑有关韩国朱子学的论文集《新儒学在韩国的兴起》^⑯等等，其工作至今仍在继续。

应该注意的是，狄百瑞的工作有一个特征，即他对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价值抱有深刻的共鸣，尤其是对宋明新儒学的同情相当显著。他的这种态度，显然与哈佛大学的主将、已故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不同，因为费正清认为儒学是近代化的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 No.4 (1994), Obituaries.

阻碍因素，故其对儒学的评价较为消极。我在美国时好几次听到“哥伦比亚学派”、“狄百瑞学派”等说法。他们自己可能拒绝这种带党派性语气的称呼，但从外部看来，狄百瑞的看法有独特的色彩是无可否认的。简单地说，据所谓的“费正清模式”，儒学总是中国人的“拘束衣”，也是应该通过西方近代价值系统的冲击与渗透而早晚要被克服的负面遗产而已。与此相反，狄百瑞则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能以此类判断标准而了解的；我们应该正当地认定新儒学在中国近世时期所产生的巨大贡献。狄百瑞的这种态度，从他早期撰写的《新儒学的再评价》一文^⑦以来，到今基本上毫无改变。

有着许多追随者的“费正清模式”，后来被人指出作为研究框架有些局限，费正清自己也到晚年才修正之，重新撰写《中国：新的历史》^⑧来代替旧著。那么，现在狄百瑞的看法就开始占统治性地位吗？十分复杂的是，事实并不如此。其实，随着研究的专门化，新一代的研究者对之接连不断地提出质疑与批判。近年来围绕“Neo-confucianism”一词发生的争论，就是其典型的例子。

例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田浩教授的论文《儒学的新方向》^⑨认为，“Neo-Confucianism”一词实际上相当含糊不清；宋明时代的“新的儒学”这一说法的涵义，每个研究者所指不一，说法很多。从而他说，为了了解在宋代兴起的丰富且复杂的思潮，我们应该用称呼一个学派的“道学（Tao-hsüeh）”一词来代替之，以限定其涵义内容。对此，狄百瑞撰写《“Neo-Confucianism”的用法》^⑩来加以反驳说，如果一注意到近世的中国与东亚世界开始的新思想运动，就很难找到更适当的词语来表现其特征。他们的主张都值得倾听，可是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还是田浩的意见有妥当之处。单纯地说来，欧阳修、王安石、方以智等人的学问都具有值得叫做“新的儒学”的性格，但它们很难包括在狄百瑞所指的“Neo-Confucianism”的范畴之内，因为狄百瑞所说的“Neo-Confucianism”专指“理学”与“心学”